

[美]

费正清 著

John King Fairbank



汉学学术文库

CHINA WATCH

观察中国

费正清看中国

唐吉洪 李放 译
张秀琦 金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3030515

K250.7
46

观察中国

费正清看中国

China Watch

John King Fairbank

[美] 费正清 著

唐吉洪 李放 张秀琦 金毅 译



北航

C1636159

K250.7
46

China Watch copyright © 1987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0-288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察中国 / (美) 费正清著; 唐吉洪等译.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
(汉阅学术文库)
书名原文: China Watch
ISBN 978-7-5534-0071-6

I. ①观… II. ①费… ②唐… III. ①中国历史—史
评—近代②中国历史—史评—现代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5249号

观察中国

-
- | | |
|-------|--------------------|
| 著 者 | [美]费正清 |
| 译 者 | 唐吉洪 李放 张秀琦 金毅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总 策 划 | 崔文辉 |
|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王帅 卜春林 |
| 装帧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650mm × 960mm 1/16 |
| 印 张 | 11 |
| 版 次 | 2013年3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
| 邮 箱 | jlpg-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

ISBN 978-7-5534-0071-6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读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汉 阁 学 术 文 库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说明

费正清被西方誉为“头号中国通”，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对中国的见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甚巨。费正清的中国史著作可以看作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最具经典意味的著作，他的史论不仅开拓了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学风，其影响亦早已深入到西方各国的决策领域，故而对把握西方对华政策，也良多参考。他的史论虽仍难免隔岸之误，但以其对中国历史把握之深，史料掌握之厚，因之和其他西方学者的同类著作相比，显然更接近于中国历史面目的本相；兼之其深厚的西方治史修养，风格自成一家。在中国，他的史著早在“文革”后期便悄然引介进来，曾经影响整整一代学人，以至于很多史家学子，在撰史立言时以影从于费正清为一时风尚。当时时下，这位西方中国史泰斗已经逝去20余年，费正清风格也不再是一种时髦。然而，芳菲散尽，风骨犹在。历史本身绝不会褪色，费正清的史著也历久弥新，成为恒久阅读的经典。

本次出版的费正清作品，平易浅显、论述精当、记录简约、体系完整，深显费正清之神韵，既堪作阅读费正清史著的初尝，又足可作简明中国通史的必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始终是站在他者的立场。书中的部分观点反映其西方学者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晚近历史的见解是应该进行商榷的，有些甚至可以看作是错误悖谬的。对于这些偏差，编者作了一些文字处理，但为尊重作者，并无大的调整，希望我们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应该保持审慎的批判态度。

谨以此书纪念资深记者西奥多·H. 怀特^①（1915—1986）

① 中文名白修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先生，1938年大学毕业后赴重庆，任《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译者注

前 言

最近，中国已经生龙活虎地向我们走来。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刚从商学院毕业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为中国姗姗来迟的市场化转型及为美国带来无限生机的利益动机拍手喝彩。展望未来，另一些专家预言，一个规模更大的现代化中国将像近年来日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样，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向我们抛售商品。按照这一思路，他们最终会向我们提供服装和家用电器，而我们则只向他们出售农产品。

但中国能真正地成为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可能仍然是另一个美国梦，即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我们可以不断预见却从未实现同中国的巨大贸易。也许以前延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羁绊，将继续减缓中国的进步。

同中国存在巨大的潜在贸易一直是西方200年来的梦想。中国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刚开始意识到，这一印象的形成经过了现实的过滤，经过了我们先入为主和联系的积累。正是这两者形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报告。

这本书收编了一位历史观察家论述中国和最近15年中美关系的文章。研究中国和美中关系，形成公众意见，这一潮流也许短暂，但也重要，很显然，我有幸成为这一现象之一部分。作者们在著书立说和评论时，都会对中国内部和有关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反应；他们根据其他人的印象做出自己的印象和评论。很快，现实和印象融为一体。

本书是评论别人对中国的反应，这种双重筛选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

道，每位出版商和新闻评论、报纸的编辑首先考虑的是所写的书是否值得出版或评论。他们需要从多个角度作出众多判断。所以，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吸引了美国民众去研究和思考中国，特别对于喜欢这些内容的人而言，他们感到这些评论反映了公共舆论。也许这种反映存在偏见，既不完整也不明确，但仍可以与民意测验相提并论。

导言（部分取自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本书五个部分都以历史背景开头。有些章节甚至以当今制高点的笔记开头；其他章节实际上是第一次出版的转载。

导言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了解自身已属不易，要理解与我们相距遥远、有着截然不同历史和文化
的中国就更加困难了。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我们正从中受益。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的联系紧密超乎我们的想象。
人权在中国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和美国一样，成为法治社会，但这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
和孔教的遗产，两者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
3000年历史的遗产，挥去不易。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关注。
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无预谋致死当属另类，会受到一种不同其上的处
罚。在古代中国却并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减轻犯人的罪责。一个
经典的案例是：1821年，一个人如其名的美国水手泰拉洛瓦从船上扔下一
只坛子，砸中舢板上一个女人致其落水而死。为了维持与广州的贸易，美
国商人将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的法律，他很快被处以绞
刑。这些案例导致了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
得到充分表述。至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
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就成为各种条约的
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美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
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超乎我们的想象。中美关系

中的其他主题也是如此，如美国希望获得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而这一愿望至今还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梦寐以求的使命也未得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了应对正迅速到来的、不确定的中美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当然这种印象非常不可靠，它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的产物，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又根据自己的观点转述给自己的听众。由此而形成的印象之多像一只万花筒，不一致的意见和变化无常镶嵌其中。人们通过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不断描述中国形象。然而，在这纷繁的印象中，每一代美国人，或至少在实践中有不同见解的杰出人士似乎都能得出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对这些观念在各阶段的分期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在美中200年的关系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起初移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直至18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甚至在中国1773年为波士顿事件提供过茶叶时，积弱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处在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之下。杰西斯（Jesuit）显示了早期传教士被我们现今称之为公共关系的才能，他所著的颇具挑逗性题名的《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这些报道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理想化词句描绘了中国，满足了为杰西斯提供资料的中国人之虚荣心，这些人都脱胎于古代科举制度的思想工厂。皇帝具有超自然的智慧和仁慈（当有错误想法而受到其惩罚则不属于此），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通过杰西斯理想化中国的报道旨在说明，即使没有天启教的谆谆教诲，人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我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19 世纪初，随着我们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在

与中国的更直接接触中开始破灭。在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排水沟里，而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收集和处理粪便用作肥料的一整套系统。但当自来水及盥洗室在欧洲开始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在与中国的贸易中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文明成果。且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新发展的产物，仅就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而言，中国至今仍在忙于追赶。

因此，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憧憬被悲惨的落后无情地取代，当复兴新教开始派遣美国传教士前往异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导致了西方的强大。中国的学者、官员自认高明，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高风亮节的传教士功不可没。

在19世纪上半叶的接触与觉醒时期，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S.Wells Williams）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资料详尽的两卷本巨著《中国》（*The Middle Kingdom*），其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1848年出版）。1883年又发行了修订本，副标题扩展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将一种不同于己的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绝不能相互分开。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

《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丛报》；二是该书吸收了威廉姆斯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所陷困境的直接观察，这令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更需要耶稣基督教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应该铭记美国基督教的扩张公式：“我们拥有，他们缺乏，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所缺乏的，使他们可以更像我们，追求我们的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致力于让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技术，以及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信

仰。很明显，我们所取得的进步仍拘泥于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对中国的基本态度。简言之，美国了解中国的历史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展现出高度的连续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全面论述中国的巨著之后，很多人紧跟其后，如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美国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辉煌与近代衰落的戏剧性对比异常鲜明，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我们对此感到庆幸，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保障了我们的治外法权，在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中，英国人让我们置身事外。历史记载表明我们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认为，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防患于未然，与所有的外国入侵者都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世纪，另一本广为流传的著作《中国人的特点》击碎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该书作者阿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多年，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及从乡村层面观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特点》收录了作者于19世纪80年代书写的一系列短评，在1894年出版，美国中产阶级将其看作描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经典之作。在引人注目的社会差异描述方面，此书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强调“贫困”和“社会团结”的社会差异。在中国，这种正式的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

其间，对中国国内的帝国主义研究已经奠定基础。通过一系列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得西方特权进一步扩大。到20世纪，这些特权的法律结构如迷宫般错综复杂。莫斯（H. B. Morse）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详细叙述了这些特权的起源，该书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作为在中国政府工作了33年的海关专员，莫斯对中国官场阅历甚广。他总结了外国强权是如何在中国建立的，为在1943年被废弃的不平等条约的研究提供了基线。

简言之，在20世纪，美国人将中国的非西方文明作为主题进行研究并进入到新的阶段。在20世纪我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了解，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复兴运动时期形成的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和19世纪时期对其的失望之情，无论好坏，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存模板的使用，有助于美国在任一时期形成对中国的看法。这种认识的连续波动在近代史中可以得到阐述。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酿成了19世纪最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狂热的义和团分子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围攻了北京使馆区内475名外国平民、八个国家的450名军人、大约3000名中国基督徒和150匹赛马（不久，这些马就被吃掉了）。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联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各军事大国间不存在火并的危险。俄国人夺取了满洲，日本人并没有干预俄国人的行动，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把俄国人赶出满洲。从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国际舞台。当八个主要国家的军队解救了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之后，义和团退到了乡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维持中国的和平，这样有利于外国贸易。1900年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肮脏、野蛮的，同尚未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文明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1900年的危机产生了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这一政策不仅使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进入中国，而且还寻求机会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20世纪上半叶，野蛮、落后与民族奋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在义和团危机过后的10年即1911年，中国成立了中华民国，美国人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并殷勤地认为中国将和我们一样成为基督教共和国。我们在对军阀时期的政治混乱甚感痛心的同时，扶植了12所基督教学校的发展。我们日益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当日本在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巩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以图超过其他西方帝国时，美国舆论站到了中国这边。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和平协议^①让日本从德国夺回山东保留其帝国主义特权时，我们拒绝批准这一条约。从这以后到1949年的30年间，我们越来越支持中华民国反对日本的侵略。

但是，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继续左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在蒋介石领导国民党执掌南京政府的1928至1937年间，无论身处中国境内还是国外的外国人都对政府寄予厚望，认为它将解决中国的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上台后，背叛了盟友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杀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产党人，并把像毛泽东这样的幸存者赶到了荒郊野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最终走向军事化，压制了社会革命。

然而，被迫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爆炸性力量。当赛珍珠（Pearl Buck）在1931年出版畅销书《大地》（*The Good Earth*）把中国农民带入到美国公众的视野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探索如何发动农民争取政治权力。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中，记录了毛泽东的故事。我们看到了该书写下的不祥之兆。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这边。尽管蒋介石对我们的投资给予相当低的回报，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偏远的延安地区却以相似的方式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高贵的印象，以至于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视其为发展的希望。但当美国人认为人民共和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我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没有农民，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作为反基督教的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冷战时期被看成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谴责中国共产党迫害、处死众多敌人的

① 指的是《巴黎和约》。——译者注

做法，另一些人则对其肃清残余，解放农民，恢复秩序的创举赞不绝口。

中美在70年代恢复外交关系，但中国在早期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极度恐怖的“文化大革命”的了解，迅速被其造成的坏影响所取代。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毛泽东及其集团离开了历史舞台；随着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期待以及旅游热潮的正常复苏，一个新时代的曙光正在出现。

人们可以注意到，就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陈词滥调地发表我们说教式的文化价值观。自从我们违背相互移民条约，在19世纪80年代禁止中国人移民以来，价值观念一直牢固地束缚着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据我们所知，今天的中国人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更公正。不是吗？例如，对堕胎的争议：为了避免人口剧增引起的饥荒（到2000年，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允许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通过高目标，中国已将人口出生率实际降低到1.7%，这仍被看成是人口的剧增，因为中国年轻人太多，但最终还是能将像癌细胞扩散的人口增长稳定下来。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能做什么呢？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这种新兴“时尚”的阵痛和胎儿（相对于母亲而言）的崇拜之中。这等同于童女怀孕^①。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在对来自美国的理解中，中国人感悟到什么了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联合起来，剥夺妇女选择权。中国的极端分子想要强迫妇女去堕胎，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反对这样做。这两者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使他们为了维护看似相反实则相似的信条各自为战。美国人主张胎儿出生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国内占绝大多数的温

① 据传童女玛利亚怀了基督耶稣。——译者注

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在这一计划中，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在分析其他国家革命的时候，我们美国人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引领者令人心悦诚服的理想或先知先觉，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希望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贫困农民大众的地位以消除社会古老的上下阶层的分岭。在革命进程的任何一个阶段，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引人注目。

相对于第二种社会梦想，我们多数人更乐意欣赏第一种梦想，即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物质文明。无疑，这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很少将后者视为一个迫切、全局性的问题。

如何将众多的中国农民带入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上流社会人士长期享受的文化生活、公共服务以及经济利益领域呢？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即使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存在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他们仍面临建立新的社会价值和新的政治体制的需要。这一理想构成了毛主席像龙一样拼搏的基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则更实际，形式更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详尽阐述。